

报国无门容纯甫

容纯甫即容闳，纯甫为其号。凡讲中国人留学史或者“西学东渐”的，总会提及容闳。因为他留学美国极早，时在一八四七年，又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（耶鲁）的中国人，那时这可是新鲜事。他晚年出版了一本英文的回忆录，一九一五年恽铁樵和徐凤石把这本书翻译过来，用的是文言，大概觉得原题直译不够“文”罢，便杜撰了一个《西学东渐记》的书名，流传开来，容闳其人其事更与“西学东渐”分不开了。

行云流水，读《西学东渐记》，一面觉得容闳是个惓怀赤子之心的中国人，虽然他曾归化为美国公民，娶一位“洋婆”，一生不少时光在美国度过，又总心系祖国，欲效力于家邦。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并不像传统的中国人——“大伙中的一个”。大概西方人文教育和熏陶，使他在很大程度上超越“血缘文化”的限制，同时也就决定了他的好愿望、好想法还不易被当时的中国所接受。爱之忧之而不能救之助之，托命异国埋骨天涯而又魂在故土，不仅是容闳一生的不幸，也是他祖国的不幸。

“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。这个想法久为容闳所怀抱。他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转觉身有负荷，“更念中国国民，身受无限痛苦、无限压制……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，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……”大概在他感觉，西学亦即对现代文明的体认，深入的

接触将能体会到其中涵蕴的价值。于是他便自己来做这方面的开路者。

容闳家居南屏镇，离澳门很近。七岁入古兹拉夫夫人办的女塾寄读，后入马礼逊学校，遇到一位美国老师勃朗，勃朗先生人很好，回国时便把容闳等三个少年带到美国去受进一步教育。自然，经过八年苦读，容闳差不多是“化”了，他归国时汉语都已讲不大好，不过一种良好的教育本身必会产生积极的引导力，它在容闳身上培养了使命感。他曾写道：“我的爱国热情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；正好相反，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。因此……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，还是我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，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。”

由于那时国家的决策者并不认为容闳的计划可行，或者正因“前门告警后院起火”的局面搞得手忙脚乱，容闳的计划，却直到一八七〇年有曾国藩、丁日昌支持，才开始筹备，其间已过去十五年。更可惜的是，一八七二年第二批幼童（后来设计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是其中之一）赴美留学，容闳身任监督，却遇到陈兰彬和吴子登两位旧官僚的牵制，吴数度向清廷奏报，谓学生有“西化”之嫌，将不成其为传统式的接班人，结果在一八八一年使全体学生撤回国内，容闳的计划中途夭折。中国的许多事情办起来往往要反复，往往过了许多年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。容闳的这件事也未能逃脱如此命运。

“一角悬崖一角山，秋心寂寞绕汀湾。”我们看容闳虽然始终不放弃“报国”的理想，实际上却不免寂寞多于奋发。海外归来，初入社会，一开始很难找到一展抱负的机会，即使在可能情况下，也是碰钉撞壁的时候多。

容闳有一段去南京访问太平天国的传奇经历。他的动机不掩饰是对太平军抱希望，希望有助于实现一些自己的主张。他

向于王洪仁珣陈述七条建议，如建立正当之军事制度，设立武备学校、实业学校，创建银行等。结果是并无结果。他谢绝了太平军赠送的官爵，失望而回。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，容闳又上过四则条陈，涉及交通业、矿业的开发等，但除了派遣留学生一项仅得虎头蛇尾之迹，其余殆无下文。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时，他将一些建议提给张之洞，张或先热后凉或默无以应。后来他又说动翁同龢、张荫桓，拟于北京设国家银行，刚见头绪，又遭盛宣怀破坏而流产。还有修铁路的计划也因困难重重徒增嗟叹。容闳渐老，作叹息言：“予之种种政策，既皆无效，于是予救助中国之心，遂亦至此而止矣。”

建于一八六五年，由容闳创议筹建的上海“江南制造局”即后来的江南造船厂，大概是他唯一留给故国的有形业绩。

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时容闳正在北京，他拥护维新，同情新党，政变发生后逃至上海，组织强学会，又受到通缉，遂往香港，后去美国，直到死。

可能因为他是先驱者，是满怀希望而始终不泯其心的爱国者，反使他不被僵化的体制以及所谓“国情”所接受。如果确实如此，也只好报国无门，以至于故土难归长眠异域。